

红墙外的长城

“四二五”和平上访



目录

还原

1 “四二五”内幕爆料：江泽民非法定性并部署当日屠杀

见证

4 历史上的和平上访：亲历者忆“四二五”长安街的那一天

专访

8 三位西方专业人士眼中的真理力量

广角

14 蒙特利尔街头：一场持续二十七年的和平坚持

18 华府跨党派议员发声 纪念“四二五”和平请愿二十七周年

聚焦

21 四二五：“极高的动员效率是如何达成的？”

26 四二五：天津事件是全部原因吗？

观点

32 反思是人类文明的共有机制

世道

34 沉默的代价

37 不被原谅的致歉

42 当“亲情”被用来逼迫人背弃原则与道德底线时

封面：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和平上访。



一九八九年北京“六四”事件中，完成清场后的中共军队的坦克。（公共领域）

“四二五”内幕爆料： 江泽民非法定性并部署当日屠杀

文 | 笔道

【明慧网】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万名法轮功学员前往位于北京市中心的国家信访办和平上访，这一事件被国际社会誉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最理性的维权行动”。近期有读者向

明慧网爆料，说出中共高级官员透露的信息。这些内部细节，揭开了当日政府内部鲜为人知的惊人内幕：一场蓄意策划的武装屠杀险些上演，而之前的“定性”过程更是一场违宪违法的闹剧。

调动军队换装待命：枪弹上膛欲重演“六四”

据该读者的爆料，有中共高级官员透露说，在“四二五”上访当天，尽管外界看到的是学员们安静有序的守候，但府右街周边的气氛却隐藏着极其肃杀的秘密：当时的中共最高领导人江泽民已秘密下令调动部队进入待命状态。

为了掩人耳目，这些士兵全部换上了警察制服，弹药上膛，只要一声令下，就会将上访现场所谓的“围攻中南海者”全部杀死。

消息指出，当时多位中央领导人极力劝阻，请求先与学员代表谈判，若上访者同意撤离，就不要开枪。后经几位高级官员与上访学员面谈，达成共识后，法轮功学员们迅速、平和地撤离，甚至带走了地上的垃圾，表现得非常有素质。若非如此，当晚的府右街极可能重演“八九六四”的血腥惨案。

荒诞的定性过程：各部委拒绝对“邪教”之说背锅

中共高级官员还揭示了法律层面上的一个巨大荒谬点：对法轮功的定性并非基于事实调查，而是源于江泽民个人的妒嫉与独断。

按照国务院正常的办事逻辑，重大定性必须要经过“基层发现问题 -> 部委调查研究 -> 提出初步结论 -> 上报国务院 -> 获得指示后执行”。

但在法轮功问题上，流程完全倒置。

江泽民先行擅自定性，随后强令各部委负责人出来“认领”这份政治责任：在一次由北京市领导、公安部领导等人参加的内部会议上，没有任何一个部委领导愿意为这个与事实调查结果相反的定性“背锅”，结果在江泽民的压力下，与会者最终一致将责任推给了当时因故未参加会议的国家体育总局局长武绍祖。

这一幕被评论人士比作“文革”再现——当年有人仅因开“选右派”会议时去了一趟厕所，回来后就发现自己被缺席推举为“右派”。

明慧网：群体灭绝仍在继续

根据明慧网多年收集的证词与数据，“四二五”上访的问题得到和平解决之后，江泽民并未因为法轮功学员的理性而收手，反而在同年七月份开始了全面的、公开的镇压。

这一镇压并未在任何一届继任党魁的手中结束，至今已持续了二十七年（注：指一九九九年至二零二六年）。迫害依旧血腥，但更加隐蔽和制度化。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虽然没有发生公开的群体屠杀，但随后专门为镇压而成立的“六一零办公室”，系统性地抓捕、转化、关押、酷刑，包括江泽民直接下令将大批上访的法轮功学员作

为器官库秘密关押、实施活摘器官，这场从第一天起就建立在谎言与违宪基础上的群体灭绝运动，被加拿大人权律师称为“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

结语

此次读者的爆料，再次印证了江泽民发动的这场对法轮功的镇压，不但缺乏法律基础，连在中共内部也未得到共识，谁也不愿出面替江泽民担责。

你是否已经意识到，这场持续了二十七年的政治迫害，不仅是针对占中国人口十分之一的法轮功信仰团体，更是继“文革”之后，对全体中国人道德和良知的毁灭性践踏？

如果你从未这样想过，现在可以搜索一下，中国社会一波波的道德滑坡、大面积害人事件，是否从二零零几年突然涌现，从此快速颠覆众人三观的？◇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北京，万名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明慧网）

历史上的和平上访： 亲历者忆“四二五”长安街的那一天

集会期间最基本的民生问题——如厕，也展现了这个群体的自律。北京的旱厕设施简陋，然而涌入上万人的厕所却异常干净。

文 | 明慧记者综合报导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发生在中国北京中南海附近的“万人集会上访”事件，至今仍是当代史中备受关注的一页。对于外界而言，这

是一场突发的政治风波；但对于当年的亲历者来说，那是一场关于信仰、勇气与自律的平和集会。

近日，一位当年的亲历



一九九八年五月，中国东北一个乡村法轮功炼功点，村民在晨炼。（明慧网）

者——来自河北的法轮功学员，分享了她与家人在长安街上的真实经历。

突如其来的消息：从农村到京城的奔赴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四日周六，平静的农村生活被一通电话打破。消息传来，部分天津学员被非法抓捕，北京成了寻求正义的最后希望。

“那天，我们骑着自行车走村串巷通知同修。”这位亲历者回忆道。不仅是她，

她近七十岁的婆婆和父母也决定启程。

最令人意外的是她年仅十四岁的女儿。考虑到十年前（一九八九年）的阴影，夫妻俩曾试图劝阻孩子留在家中，甚至在女儿裤子里缝了二百元人民币，叮嘱她：“如果爸爸妈妈回不来，你就拿着这钱投奔亲戚。”然而，这位十四岁的少女坚定地表示：“我也是大法中的一员。”最终，一家三代人上了前往北京的客运车。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北京，万名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明慧网）

长安街上的平静：红墙外的克制与自律

四月二十五日清晨八点，长安街上已陆续聚集了大量人潮。在警察的指引下，人们规律地站在人行道内，形成了三、四行的队列。

现场并没有外界想像的围攻与喧闹。这位目击者描述，尽管许多人来自习惯大声讲话的农村，但在现场，大家都自觉地低声细语。年轻人主动站在前排，让老人坐在

后方休息。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对抗误解，现场还相互提醒：“不要叉腰，不要抱胸，保持平和的神态。”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路对面持枪走动、不时抽烟的军警。在长达十余小时的对峙中，现场始终保持着惊人的静谧与秩序。

鲜为人知的细节：厕所门口的守候者

集会期间最基本的民生

问题——如厕，也展现了这个人群的自律。北京胡同当年的旱厕设施简陋，但令参与者惊讶的是，涌入上万人的厕所竟然异常干净，地上撒了石灰，污物也被及时清理。

“后来我们才知道，北京的学员就在厕所外候着，每隔几分钟就打扫一次。”这位亲历者感叹，他们在长安街站了十小时，这群志愿者就在厕所门口服务了十小时。

散场后的惊人一幕：连军警烟头都带走了

当天下午四、五点，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亲自走出中南海与群众对话。大约晚上七点，消息传开：“要求已获答应，天津放人了。”

就在人群准备散去时，发生了令在场警察和军人震惊的一幕：上万名群众在撤离前，整齐地弯腰捡拾脚下的纸屑、食物残渣，甚至是军警丢弃的烟头。仅仅几分钟内，原本聚集万人的长安

街恢复了往日的洁净，人群迅速向四周散去，没有交通拥堵，没有大声喧哗。

尾声：大雨后的清白

当晚，当亲历者一家回到河北家中时，天空中落下了多年罕见的大雨。她回忆道，这场雨像是将中南海门前最后的一丝尘土也冲刷干净了。

“四二五”事件至今已过去二十七年。对于公众而言，这或许是一个政治符号，但对于像这位河北农村妇女一样的亲历者来说，那是她们生命中关于信仰、善良与公民权利的一次深刻实践。

后记

据了解，当天参加上访的学员多为公职人员、农民与学生。集会结束后，他们准时出现在周一的工作岗位与学校。这场万人集会，在当时以一种极其罕见的和平方式画下了句点。◇

三位西方专业人士眼中的真理力量

文 | 明慧网多伦多记者报导

“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今天，我一定会参与，因为我深信真理的力量。”艺术家里奥(Leo)在谈到“四二五”时说。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在北京以史无前例的理性自律，树立了和平上访的道德丰碑。时至今日，这种被称为“四二五”的精神，正跨越文化与国界，在海外西人社区中引发深度回响。近日，加拿大多伦多记者站采访了三位来自艺术、教育及媒体行业的西人学员，听他们讲述这段历史如何指引他们找到“真我”，并成为其持之以恒传播真相的动力源泉。



艺术家里奥。(明慧网)

艺术家里奥(Leo)： 在历史中寻获人生的“真我”

现年三十九岁的艺术家里奥，在一九九九年“四二五”事件发生时年仅十二岁。通过明慧网了解这段历史后，他感叹道：“这件事对我最大的影响，是让我看到了真相本身的力量。”

在开始修炼法轮功之前，里奥曾长期陷入对人生意义的迷茫与沮丧中。他尝试过多种方法去探索生命奥秘，却始终未能找到答案，直到二零二一年，他在明慧网上读到了改变他一生的文字。



幼儿教师玛希。(明慧网)

通过明慧网文章，他了解了“四二五”事件的始末。

随后他读了法轮功的主要著作。“第一次读《转法轮》，我泪流满面，感受到难以言喻的奇妙。当天，我就成功戒掉了多年未能戒除的烟瘾。”

“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对改善人民健康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一点甚至得到了中国政府自身开展的科学研究的证实。”

修炼后，里奥不仅身体恢复了健康，更找回了久违的活力。如今，他积极投身于各种讲真相活动，将自己

受益的经历分享给他人。他深有感触地说：“当年上访学员的善行是显而易见的，即便是当时处理此事的高官，也因看到真相的力量而下令释放了被拘留的学员。”

幼儿教师玛希 (Masi) : 守护跨越国界的“道德丰碑”

玛希是一名幼儿教师。对于“四二五”事件，她心中满是敬佩：“学员们有尊严地、和平地向政府表达诉求，而不是通过冲突解决问题。这就是它被公认为道德丰碑的原因。”

“我差不多每年都参加纪念活动，这会给我提供一次回顾历史的机会。”她说。

玛希的这份感悟源于她的修炼实践。二零零一年，正处于人生低谷、备受抑郁与病痛折磨的玛希，通过药物缓解，但效果不佳。那段时间，她问自己：为何要遭受这么多痛苦？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如何能够不被名利所困？为此，她接触了很多灵修方法，但这些疑惑仍未获得解答。

一次，在参加法轮大法学习班后，命运发生了转折。她意识到，这个功法不一般，很纯、很正，而且不以金钱和名望为目的。“在修炼大法的二十多年里，我的身体素质得到提升，我的思想变得更加平静。”

如今，六十一岁的玛希依然精神焕发，样貌如同四十多岁的人，每天跟一群年轻人工作。她的亲人和同事都说，玛希变得更有耐心，

更友善了。玛希表示：“这些变化是因为我遵照‘真善忍’的原则，在面对困难时，向内找，提高自己。”

针对中共对该事件的抹黑，玛希有着清醒的认识：“当时江泽民在寻找镇压借口，向世界传递了误导性的描述。”她表示，每年参加纪念活动都是一次回顾历史的机会，旨在记住那些以大善大忍之躯守护真理的先行者。

媒体工作者丹（Dan）： 从物理奥秘到宇宙根本法则

曾在滑铁卢大学攻读数学物理专业的丹（Dan），现在一家国际媒体公司工作。他以理性视角看待“四二五”：

“那时大家都在讨论弦论、期待统一相对论与量子力学，但我看着桌上的《转法轮》，意识到‘真善忍’才是宇宙运行的最根本法则。”

丹出生于苏联时期的乌克兰，深知在共产党统治下公开表达信仰的艰难。他认为



在媒体公司任职的 Dan。（明慧网）

“四二五”和平请愿是学员们内心“真我”的觉醒，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人的高尚风貌。

二零零七年在大学一年级开学不久，学校组织了一场社团招新会，场面甚是热闹。在眼花缭乱的展位中，丹注意到一位穿着黄色T恤的男生，心无旁骛地打坐，似乎周围的一切都不存在。丹在内心赞叹：“这个人知道如何控制自己的思想啊！我也要这样！”于是，丹接触到了法轮大法。

丹一开始炼功，就感受

到了能量在体内流转。“学功的当晚，我就可以正常入睡了。阅读《转法轮》后，我了解到更多修炼的内涵。”

修炼法轮功不仅解决了丹的长期失眠问题，更彻底改变了他的性格。曾经强势、好胜、爱挑战权威的他，学会了提高心性，甚至主动向父亲道歉。现在的他，将这份“为他”的心用在了反迫害、讲真相的工作中，持之以恒地向世人揭露谎言。“我希望更多人了解大法真相，揭露谎言。”丹对记者说。

让真相成为跨越国界的力量

三位西人学员虽然背景各异，但都在“四二五”精神的感召下，找到了生命的归宿。对他们而言，那场发生在二十七年前和平上访，不仅仅是一段历史，更是一种超越时空的正义力量，持续指引着这些来自不同专业领域的西方学员，在传播真相的道路上坚定前行。◇





二零二六年四月十九日，台北市政府广场。法轮功学员召开记者会并集体炼功，纪念“四二五”上访二十七周年，多位政要到场发言，赞佩法轮功学员坚持和平反迫害的勇气。图为集体炼功。（明慧网）

蒙特利尔街头： 一场持续二十七年的和平坚持

在北京的弟弟和他谈起这事时说：“经历六四屠杀之后，北京人心灰意冷，看到法轮功学员上访，感觉国家又有希望了……”

文 | 林嘉（加拿大）

【明慧网】那是一九九九年在北京的一场和平请愿。上万人安静有序地站立，离去时地面不留一片纸屑。二十七年后，这份坚韧与理性在加拿大蒙特利尔街头重现。二零二六年四月二十一日，蒙特利尔部分法轮功学员再次在中领馆前汇聚，用中、英、法三种语言，向世界讲述一个关于信念与坚守的故事。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逾万名法轮功学员前往北京国家信访局和平上访，这一事件被国际社会誉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最理性的维权行动”，却被中共江氏集团歪曲为“围攻中

南海”，并作为迫害的借口。二十七年来，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秉持和平理性的精神，不畏中共打压，坚持反迫害。每年四月二十五日前后，蒙特利尔法轮功学员都在中领馆前举行抗议集会。



敦促加拿大政府制止中共的跨国镇压行为

集会者在发言中指出：“四二五上访让全世界目睹了法轮功学员大善大忍的胸怀，以及他们平静、祥和与理性的修炼素养，被誉为中华大地上的一座道德丰碑。”

“在随后的几个月，这一合法的上访行为却成为打压的借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进行绑架、酷刑、杀害，甚至活摘器官。为了掩盖其罪行，中共通过渗透国外的政府官员或媒体，试图把迫害输出到海外。”集会者呼

吁加拿大政府公开谴责中共的迫害，“我们也敦促加拿大政府制止中共在加拿大境内的一切跨国镇压行为。”

他们还呼吁中领馆工作人员：“守住内心的善念，拒绝为江泽民留下的政治罪恶背锅。不要对中共抱有幻想，与中共切割，为自己和家人创造美好的未来。”

为什么“跨国镇压”这件看似“远方”的事，实际上关乎每一个加拿大人？

现场发言者指出，跨国镇压的本质是对加拿大主权的侵蚀：当外国政府在加拿



图1~2：二零二六年四月二十一日，蒙特利尔中领馆前，法轮功学员集会。（明慧网）

大领土上威胁、恐吓甚至直接开设“警察站”来管辖当地居民时，这实际上是在加拿大境内行使外国法律，让加拿大的主权形同虚设。

这种行为，今天针对的是某个信仰团体，明天就可能针对任何不符合该外国利益的加拿大公民。

跨国镇压还会破坏社区信任与社会凝聚力，向海外法治社会引入暴力与组织犯罪，并干涉民主选举。

回忆：目睹“四二五”上访的百姓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在集会上，来自山西的法轮功学员王女士回忆说，一九九九年“四二五”事件发生不久，她去朋友家串门，朋友的父亲一见到她就竖起大拇指，兴奋地说：“我在北京看到法轮功了，太震撼了。”

当时他去北京探望母亲，他母亲家在府右街附近。他出去遛弯时，看见法轮功学员上访的队伍：“我从这头



走到那头，男女老少，那么安静有序、守规矩，那场面太了不起了。”

他说：“当时心里还想，这些人可能都会被抓走，没准儿政府的坦克、机关枪都会来，因为老北京都知道，虽说是上访的权利，可中共政府根本不会给老百姓自由。”让他感到意外的是，到了晚上，事件得以圆满解决，那么大的人群，静静地一下就散去了。

在北京的弟弟和他谈起这事时说：“经历了六四屠杀之后，北京人心灰意冷，在看到法轮功学员上访之后，感觉这个国家又有希望了，



图1~3：集会现场，蒙特利尔市民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明慧网）

如果中国人都像法轮功学员这样，中国就有了希望。”

被祥和正气感动的当地市民

路过的市民被集会的祥和与正气场面所感动，不少人向法轮功学员表达支持。

在中领馆旁一所职业学院上学的米雅和朋友，都在反对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征签信上签了名。她说：“这么平和的抗议，我感到十分美好。每个人手举横幅，静静地站着，递传单，告诉我们闻所未闻的迫害事实。你们用令人尊重的方式表达了抗议。我真心希望更多的人关注此事，签名支持你们。”

另一名学生斯蒂夫说，他去年就签过名了，“我一直都支持你们。你们真了不起，让人们知道发生的迫害，人们应该关注此事，迫害应该被制止。”

市民约翰是第一次了解到法轮功遭受迫害。他马上签名，并说：“我反对迫害，发生在中国的迫害让我感到心碎。我支持你们。”

市民德伦特看到法轮功学员的活动感到惊喜，他表示，他了解法轮功学员信仰“真善忍”，遭到了中共的残酷迫害，包括活摘器官，他签名时说：“我百分之百地支持你们！”◇

华府跨党派议员发声 纪念“四二五”和平请愿二十七周年

联邦参议员里克·斯科特批评中共是世界上最严重的人权侵犯者，要求其**为强摘器官等卑劣行径承担法律责任**。

文 | 明慧网华盛顿 DC 记者李静菲报导

二零二六年四月二十五日，**适值万名法轮功学员在北京和平上访二十七周年**。美国首都华盛顿部分法轮功学员于四月十一日在中国驻

美大使馆前集会，**呼吁停止迫害**。多位美国联邦参、众议员发表声明支持，**强调将持续推动立法追究中共责任，并谴责近期升级的跨国镇压行为**。



二零二六年四月十一日，美国华盛顿中使馆前，法轮功学员集体炼功，纪念“四二五”和平上访二十七周年。（明慧网）

华府集会 关注跨国镇压趋势

四月十一日下午，部分大华府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在中使馆前集体炼功。学员代表杜恩·哈珀在集会中指出，中共对该群体的压迫已呈现海外扩张趋势。他以神韵艺术团近期在美演出期间遭遇的炸弹与枪击威胁为例，认为这是北京方面“跨国镇压”不断升级的讯号。哈珀呼吁国际社会打破沉默，防止迫害蔓延。

国会资深议员：推动立法追责

多位长期关注人权议题的联邦议员透过声明表达立场。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共同主席、联邦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Rep. Chris Smith）对法轮功学员的勇气表示敬意。他指出，中共近三十年来的残酷行径将被视为二十一世纪最严重的罪行之一。史密斯强调，他将持续推动二零二五年推出的《制止强摘器



多位美国国会议员发表声明，向全球的法轮功学员表达敬意，并承诺追究中共罪责，直到终止这场迫害。上排左起：美国联邦参议员里克·斯科特、联邦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联邦众议员迈克尔·麦考尔、联邦众议员汤姆·蒂凡尼、联邦众议员尼尔·邓恩、联邦众议员扎克·纳恩。（明慧网）

官法案》(HR 1503)，确保人权问题在美中关系中占据优先地位。

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荣誉主席迈克尔·麦考尔(Rep. Michael McCaul)则发表郑重承诺，强烈谴责中共对信仰自由的践踏，并表示将坚定地与受害者站在一起。

跨委员会声援 谴责人权侵犯

除了外委会，来自不同职能委员会的议员亦加入声援行列：

联邦参议员里克·斯科特(Sen. Rick Scott)批评中共是世界上最严重的人权侵犯者，要求其为强摘人体器官等卑劣行径承担法律责任。

众议员、中共问题特别委员会成员扎克·纳恩(Rep. Zach Nunn)承诺将在委员会内持续努力，直到追究北京责任并结束这场迫害。

联邦众议员尼尔·邓

恩(Rep. Neal Dunn)赞扬二十七年前学员面对打压仍守护信仰的和平方式，称中共至今仍是对全球宗教自由最大的威胁。

联邦众议员汤姆·蒂凡尼(Rep. Tom Tiffany)表示，对中共长期迫害宗教少数群体、异见人士及记者的“斑斑劣迹”深感担忧，并重申美国支持行使良知自由的立场。

背景回顾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因争取合法修炼环境、出版自由和要求释放被天津公安抓捕的四十多名学员，自发前往北京国务院信访办和平上访。此事件被国际社会视为中国史上最大规模的理性抗争，然而随后被时任中共党魁江泽民歪曲为“围攻中南海”，并于同年七月发动全面镇压。此场迫害目前已持续近二十七年。◇



二零二六年四月二十五日，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市中心。北欧法轮功学员纪念“四二五”和平上访，民众驻足了解真相。（明慧网）

四二五： “极高的动员效率是如何达成的？”

文 | 笔农

【明慧网】“四二五”事件（发生在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的北京）是中国当代史上一个极具曝光度的事件。尽管时间已过去二十多年，许多人仍感到好奇：

在一九九九年那个互联

网未普及、移动通讯尚不发达的年代，上万人在极短时间内从各地汇集到北京中心地带，这种极高的动员效率是如何达成的？是完全自发的“口碑相传”，还是存在一套严密的地下组织网络？

据明慧网及相关参与者的记述，针对“一九九九年通讯不发达情况下如何实现万人汇集”这一疑问，其文章中讲述的事实与逻辑可以整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消息的传递方式：以“炼功点”为中心的口耳相传

在明慧网的记述中，信息的扩散并非依赖现代通讯工具，而是基于当时遍布全国的物理网络：

其一，炼功点的口耳相传：当时全国几乎每十个人中就有一个人在学炼法轮功，各地都有晨炼的“炼功点”。天津事件发生后，相关的抓捕消息和“天津不做人，让去北京反映情况”的消息，通过辅导员（义工）或学员在早晨炼功时互相告知。

其二，物理流传：学员之间通过登门拜访、电话（座机）询问，以及在炼功点交换信息。这种“人传人”的速度，在拥有至少数千万学

员的群体中，如呈现出几何级数的增长，并不奇怪。

其三，有对比才知是多是少：很多人一听“上万人”就觉得“哇，这么多人”，这是从数字上判断；并且，在现实体感中，一万到三万人聚集在北京市中心的街道或特定区域，会产生极强的视觉冲击力和交通挤塞感。

然而，一万人是多还是少？大家知道，如果是一场大型露天音乐会，单日参加人数可能会有三万人~八万人。如果去了八万人，人们会说盛况空前；只去了一万人，人们会说人太少了。不是一万人少，而是“有比较才有鉴别”。

那么“四二五”呢？当时中国有八千万人~一亿人炼功，只去了一万人~三万人，这个比例，应该说是很少、不多，而不是很多。

从天津事件（四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到“四二五”上访，中间只有

两三天，一万人这个传播速度，其实很符合当时中国的通讯条件，以及法轮功学员之间保持联系的草根方式。

二、是“自发”还是“动员”？

明慧网文章中反复出现的描述是，“四二五”事件并非由某个“中心”下令发起的，而是大量个体的自发选择：

1) 许多文章提到，学员听到天津抓人的消息后，基于“为大法说句公道话”的朴素心理，自发决定前往。

2) 文中记述，并没有统一的指挥部。很多人是到了北京、到了信访办附近才发现有这么多志同道合的人。

3) 时间线的演进（九九年四月二十二日～二十五日）

根据明慧网整理的事实，万人汇集经历了一个约三天的发酵过程：

- 二十二日～二十三日：天津事件发生，消息开始在天津及周边的河北、北京地区传播。

- 二十四日：更多外地学员得知消息，开始动身。因北京交通便利，周边省份的学员通过火车、长途汽车甚至骑自行车赶往北京。

- 二十五日凌晨：早期到达的学员多聚集在信访办所在的府右街一带。文章描述称，随着后续赶到的人越来越多，现场警察开始引导人群，最终形成了围绕中南海 / 中央信访办的态势。

4) 现场秩序的维持事实

针对外界对“组织严密”的猜疑，明慧网文章通过描述细节来解释这种“秩序”的来源：

- 行为准则：文章称，学员们自觉遵守“真善忍”的原则，现场没有人领队喊口号，大家只是安静地站立、读书，或者炼功。

• 环境维护：广为人知的细节是，学员在离开时捡起了地上的垃圾，甚至包括警察丢掉的烟头。明慧网认为，这种“严密”其实是个人高度自律的体现，而非军事化的指挥。

5) 对“引导”情节的记录

明慧网文章中经常提到

一个关键细节：警察带路。

许多亲历者在文章中回忆，四月二十五日早晨他们到达时并不清楚该站在哪里，是现场的警察将不同方向涌入的人群引向府右街，甚至“有警察引领我们来到了新华门的红墙之外”。

据《“四·二五”我们在长安街上》：“我们站在



二零二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德国法轮功学员在勃兰登堡门纪念“四二五”。(明慧网)

新华南门东边大约三、四十米的地方（在“四二五”的资料片里就有这一地段），对面马路上站着持枪的军人，大约三五步站一个人。他们并不是像在门口站岗那样一动不动，他们来回走动，有的抽烟，有的交头接耳，还有的走到我们面前，看我们手里拿的东西，他们有些人看起来不耐烦。而我们这边男女老少、来自全国各地的普通老百姓，则是安安静静、满脸平和地站着。”

新华门是一个很敏感的地点，戒备森严，没有“人民”的身影。突然有几十甚至上百的普通百姓停留在附近，视觉上会感到非常突兀。只需要强调一下人数，绝大部分中国人都会轻易相信，这是一场对中南海的“包围”。

至于“围攻”一说如何形成的，我们没有找到任何“攻”（也就是攻击、言语和肢体冲突）的证词，不知党报和央视用“围攻”一词

的依据是什么。

另一个情节是，在天津事件现场，当地学员被告知：此事必须去北京才能解决。

结语：

在历史研究中，法轮功学员当事人的回忆，被视为“参与者叙事”。它解释了在通讯技术落后的年代，强大的共同信仰和基层社交网络（炼功点）是如何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现代通讯工具的作用，完成了上万人的集结。此事如果发生在智能手机时代，就不止上万人了。

然而，当一个高度自律的百姓群体，以一种极为安静与平和的方式，站到了高度敏感的政治空间周围时，这种“出现”和“静默”在时任总理朱镕基的眼中，是一个直接与群众沟通、座谈的好机会；但是在时任中共总书记江泽民的心里，却成了比呐喊更具有威慑力的“攻击”。◇

四二五：天津事件是全部原因吗？

文 | 郑岩

【明慧网】公开资料通常将天津《青少年科技博览》杂志刊登何祚庥的文章，以及随后的天津警察抓人事件视为“四二五”上访的导火索。然而有质疑者认为：仅凭一篇文章和局部冲突，是否足以引发万人上访？当时中共内部对法轮功群体的态度已分化，事件是否在某种程度上被利用，成为加速决策层“收网”的契机？

第二个问题很容易回答，因为控制思想是中共的统治手段。法轮功讲“真善忍”，与共产党是完全不同的道德体系。鉴于法轮功的受欢迎程度，共产党迟早要动手的。

第一个问题，答案是否定的，上访不是由一篇文章引起的。我们可以顺着时间

线索去了解历史：

1. 气功热

一九九一年，中国人民已经普遍不再相信共产主义。中共非常害怕在中国也发生“和平演变”，另一方面又担心当时全国的气功热，于是成立了“九人工作小组”。小组成员级别很高，是来自国家体委、国家科委、卫生部、公安部、中宣部、财政部、公安部、总政联络部、武警总部的正副部级官员，目的是严密监控气功组织。

2. 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突出因而遭调查

一九九四年，法轮功引起了公安的特别注意：因为祛病健身效果好，讲“真善忍”，炼功人数快速增加。

同年，一些地方派公安人员到法轮功人群里搞“卧底”，结果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情况。一九九四年底，法轮功创始人停止在中国大陆传功。

3. 有益身心 炼功人数激增

一九九六年，法轮功学员的人数高于任何其它气功。因为没有名单，来去自由，所以没有确切数字，但据估计有几千万人，甚至一亿人。在修炼法轮功的人群中，有

很多党政干部，包括退休老干部。对此，江泽民非常嫉恨，嫉妒法轮功创始人有巨大的影响力，恨法轮功不巴结他、不愿为其所用。

4. 《光明日报》事件

一九八二年五月十三日，时任中宣部部长胡耀邦（后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指示中宣部下达“三不”政策，即对气功和特异功能“不宣传、不批判、不争论”。



一九九八年五月十五日，国家体育总局领导赴长春视察法轮功炼功点。（明慧网）

同年三月，张震寰主持了一次特异功能表演，国防科工委某局副局长伍绍祖（后任国防科工委政委）观看表演后，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信中有这样一段话：

“纵观科学发展的历史，当初哥白尼指出日心说，伽利略坚持地球转动说，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摩尔根提出基因论，都遇到世俗势力的严厉抨击，拥护新说的人甚至丢掉了性命，如布鲁诺。苏联正式把基因论封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伪科学’，而事实却恰恰证明，他们的‘李森科学说’才是伪科学。从以上所举的例子可以看出，一些旧理论所不能解释的现象，往往是科学跃进的先声，一旦被发现并上升为科学的理论，就有着十分重大的科学意义和实用价值……”

而在一九八五年，出身于清华大学理论核物理研究生，时任国防科工委政委的伍绍祖，联合中国核化学学

家腾藤（原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中宣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和安全部部长贾春旺（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实验核物理专业毕业），向上层领导写信。

这三位政府重要部门的负责人，在信中阐述了特异功能在科学上的意义，毛遂自荐来负责特异功能研究及其相应的政策和管理工作。此信得到有关负责人的批示和同意，从此中国有了“人体科学三人领导小组”。

时至一九九六年，中宣部副部长徐光春为捞取政治资本，召集十个中央大报的总编开会，要《光明日报》刊登诋毁法轮功的文章，并要其它各大报转载。

一九九六年七月二十四日，新闻出版署向全国各省市新闻出版局下发内部文件，禁止出版发行法轮功书籍。至于二零一一年三月一日，《国家新闻出版署第50号令》废止了中国对法轮功书籍的

出版禁令，这个话题，我们可以另文研究。

徐光春当时想给法轮功扣上“初级简陋邪教”的帽子。然而《光明日报》刊登诋毁文章后，有关部门收到了几十万封群众来信，澄清事实真相，以致有关人员对法轮功的进一步打压暂时搁浅。至于二零一四年六月二日，中共《法制晚报》重申了公安部【2000】39号文件的通知，再次明确法轮功不是邪教，这是后话。

5. 一九九七年两次秘密调查

一九九七年一月和七月，罗干掌控的公安部两次在全国范围调查法轮功，欲定为“邪教”。结果全国各地公安局经充分调查后，均上报“尚未发现问题”。

尽管没有证据，公安部一局发出的公政【1998】第555号《关于对法轮功开展调查的通知》，仍称其为“邪教”。在中国社会，这种公

开的执法犯法和宣传造势，是惯用的政治运动的前奏。

6. 北京电视台事件

一九九八年五月，罗干的连襟何祚庥（清华大学毕业、曾撰文断言“量子力学的发展论证了江泽民‘三个代表’的理论是科技创新评价体系的根本性标准”的中科院院士）在北京电视台《北京特快》节目中刻意抹黑法轮功。很多法轮功学员闻讯前去北京电视台用亲身经历说明实情，电视台了解了情况后，对节目做了更正。

7. 何祚庥被北京禁言

何祚庥的挑事，引起一位北京副市长的不快。后者下令不准其在北京的媒体上乱说。在北京被禁，这正是一九九九年何祚庥转到天津去发表诬蔑文章的原因。

8. 公安部再度挑事

一九九八年七月二十一

日，公安部一局又向全国公安部门发出《通知》，引发新疆、黑龙江、河北、福建等地基层公安部门强行驱散炼功民众，非法抄家，私闯民宅，没收个人私有财产。

9. 离休老干部提交调查报告

面对公安在各地的骚扰，法轮功学员纷纷给上级写信反映情况。

一九九八年下半年，以乔石为首的部分全国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详细调查和研究之后，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并于同年的年底向以江泽民为首的政治局提交了调查报告。

政治局成员看了调查报告。时任总理朱镕基看了报告之后很高兴，作了批示，大意是不要去干扰法轮功学员炼功。朱镕基的批示是基于经济和社会治理效率——如果一个功法能为国家省

下大笔医疗费，并且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政府理应支持。然而，直到一九九九年“四二五”，法轮功学员们依法去北京上访时，才得知朱镕基总理在一九九八年底曾有批示。

江泽民看了调查报告之后，很不满，并把报告交给了罗干。时任中央政法委书记的罗干接到报告之后，根据江泽民的态度做了什么，包括他是否直接扣押了朱镕基总理的批示，对于熟悉中国体制运作的人来说，不难猜出结果。

10. 一九九九年天津事件

何祚庥在罗干的支持下，尽管被北京禁言，仍于一九九九年四月十一日在天津教育学院《青少年科技博览》杂志上再度发表诽谤法轮功的文章。

一九九九年四月十八日至二十四日，一些法轮功学员前往天津教育学院及相关

机构反映真实情况。

四月二十三、二十四两日，天津市公安局动用防暴警察，殴打反映实情者，导致多人流血受伤，警察并抓捕了四十五人。当法轮功学员请求放人时，在天津市政府被告知：由于公安部的介入，如果没有北京的授权，被抓捕的人不会得到释放。天津公安向法轮功学员建议：“你们去北京吧，去北京才能解决问题。”

“去北京”？北京那么大，去哪里能解决这个紧急事态呢？

行政诉讼、人大政协、媒体渠道都行不通，也就是“县官”和“现管”都不管用了。那么在“民告官，法院不敢管”、乔石这种级别的退休老干部提交的调查报告都被江泽民以个人意志否定、媒体这种“第二信访办”更不敢发声的国家，“包青天”家住哪里、衙门开在哪里呢？

试想，即便是现在，中国的老百姓遇到急事，除了拨打报警电话，有多少人知道政府的大门朝哪开？自己需要的法律程序有哪些呢？特别是遵纪守法的公民，对警察是信任的——问路找警察，捡到钱包交给警察，报案找警察，所以当有穿制服的警察指挥上访群众站到北京新华门外的围墙边等待的时候，群众服从安排是很自然的，既不违规，更不违法，对任何人和公共财物没有任何伤害。

那么，是谁无风三尺浪？又是谁不惜以亿万中国人的基本人权和生命为代价，非要置法轮功于死地呢？是谁将这场迫害维持了近三十年？他们的动机和目的是什么？是为了人民的权益吗？还是为了一己之私？这场以法轮功为假想敌的政治运动，对中国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对中国的法治，又造成了怎样的致命重创？◇



反思是人类文明的共有机制

文 | 一言

【明慧网】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中，人权与道义始终是维系社会稳定与国际秩序的核心力量。

面对数以亿计的善良人民遭受着超过四分之一世纪的人权迫害，当有人提出“解决了法轮功问题，中国才能好。支持法轮功人权，美国才能好”时，这并不是在喊夸张的政治口号，而是触及

了现代文明的一个非常核心的逻辑：人权与道义的联动效应。

对于中国，解决法轮功问题不仅是处理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的冤情，更本质的意义是修复法治体系和重塑道德底线。“真、善、忍”是普世价值。如果一个基于“真、善、忍”的庞大信仰群体可以被个别人随意定性、



(iStock 合成图)

剥夺基本权利而得不到法律的保护，那么这种体制逻辑终将会伤害到每一个普通的公民。

对于美国及国际社会，这涉及到全球文明的价值共识。支持人权不仅仅是政治姿态，更是对普世价值的捍卫。如果国际社会在面对大规模人权迫害时选择沉默，那么这种价值观的倒退，最终也会侵蚀美国及文明世界自身的根基。

正如《四二五：“极高的动员效率是如何达成的？”》和《四二五：天津

事件是全部原因吗？》两篇文章所梳理的那样，历史的真相往往藏在那些被掩埋的事实、被扣押的批示、被剥夺权益的百姓、被刻意引导的人群以及被抹黑的善意言行之中。

当人们开始愿意剥开层层迷雾去审视这些细节的时候，反思就已开始。反思让社会避免盲目重复错误，为国家赢得神的佑护。反思之所以重要，还因为它是人类社会避免崩坏、维持传统和文明连续性的关键自我修正机制。

人权从来不是“某个群体”的问题。价值体系的崩塌会反噬所有国家，沉默会形成“负面示范效应”。

如果国际社会对严重的人权问题不再关心，那么自由世界内部的价值共识就会被弱化。因此，国际社会关注人权，不仅是“道义”，也是维护自身制度稳定的一种方式。◇

沉默的代价

如果她们不选择沉默，她们的孩子或许至今仍能承欢膝下……

文 | 刘毅

【明慧网】沉默是金吗？在人际冲突或琐碎的生活摩擦中，我们选择不做声、不表态，随其自然，那是一种豁达与修养。此时，沉默确实是金。

但在罪恶面前，沉默绝不是金。面对暴行，沉默是对恶行的无视，是对真相的抹杀，更是对作恶者的纵容。埃德蒙·柏克曾言：“邪恶盛行的唯一条件，是善良者的沉默。”当良知陷入集体沉睡，沉默便不再是避风港，而是一条通往深渊的缓坡。

在电影《穿条纹睡衣的男孩》里，德国司令官的太太最初对邻近的集中营一无所知。当她得知那是一个屠杀生灵的魔窟，而丈夫的工作就是管理这台死亡机器时，

她曾表现出本能的厌恶与愤慨。然而，在以后的日子里，她抑郁了、沉默了。她本想带着孩子逃离，命运却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她的儿子布鲁诺阴差阳错地进入了集中营，死在了毒气室。

大雨滂沱中，这位母亲撕心裂肺的嚎哭显得那样微乎其微，淹没在天地之间。这哭声里是否也带着上苍的质问？似乎上苍也在质问她：当你看到别人被奴役、被杀害时，你制止过吗？你搭救了吗？在罪恶中沉默不语也是犯罪啊！犹太人每天都在被毒死，你没有一点责任吗？你为他们求救过吗？你们为何承受丧子之痛？是不是父母造的罪业连累了孩子，孩子在为父母赎罪？

冷眼旁观杀人，痛失挚爱之子，但愿这只是银幕上的悲剧。可惜，现实往往比电影更加残酷。

二零一四年三月，内蒙古赤峰市“六一零办公室”主任杨春悦，在经历癌细胞万箭穿心般的折磨后死亡。而早在二零零五年，杨春悦的二十八岁的儿子杨志慧（杨春悦利用职权把他弄到“六一零办公室”当司机）开车钻入一辆大货车底下，盖骨被掀开，当场暴毙，坐在副驾驶座位上的人却安然无恙。杨春悦的妻子难以接受这惨烈的事实，哭了一个多月：“我们缺了什么德啊，出了这样的惨事！”[1]

作为母亲，丧子之痛的苦涩与绝望令人动容，但因果的逻辑却冷峻如铁。上苍可能也在质问她：当杨春悦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迫害死几十名法轮功学员，制造出了几百起冤案，导致数百人次被非法判刑，千余人次

被非法劳教、拘留时，你在做什么？你提醒过吗？你劝说过吗？你阻拦过吗？对杀人的漠视和沉默，就是在助长罪恶，共同造孽。自古杀人偿命是天理，你的丈夫不该去偿还那几十条鲜活的生命吗？一个人罪恶太大，就会殃及家人。儿子的悲剧，是不是父亲作恶太多造成的呢？

我们总以为，只要不亲手参与作恶，自己就是清白的；只要不主动传播谎言，自己就是诚实的。我们总以为，只要犯同样罪行的人足够多，就法不责众，自己不需要承担作恶的后果。事实上，对歹徒的嚣张无动于衷，就是在为恶行提供温床；对弥天大谎漠然置之，就是在放任毒素蔓延。

几十年前，几百万犹太人的苦难，因全世界的沉默而持续了十二年（一九三三年~一九四五年）；而今，面对“天安门自焚”等旨在煽动仇恨的谎言，面对活摘器官等

惨绝人寰的暴行，许多中国人的漠视，让这场浩劫持续了二十七年（一九九九年～二零二六年）。那些沉默者，幻想着自己最多是个旁观者，无功无过，却不知当大洪水汹涌而来时，只有上帝认可的善良人诺亚，才有幸带领全家人在大洪水过后安全地走出方舟。

昊昊红日，朗朗乾坤。正义之所以能永存，是因为总是有少数人敢于在令人窒息的黑暗中发声。如果当年纳粹司令官的太太，或者杨春悦的妻子，能以女性的柔情与正义感极力劝阻丈夫放下屠刀，结局是否会不同？如果她们不选择沉默，她们的孩子或许至今仍能承欢膝下。可惜，眼泪无法逆转时空，哭泣也换不回逝去的生命。

真正的好人，不会在罪恶中保持沉默。因为我们知道，沉默的代价是被邪恶裹挟，最终被其吞噬。

如果你爱你的先生，当

他欺凌无辜时，请不要保持沉默，请劝阻他放下屠刀，那是对他灵魂的救赎；如果你爱你的孩子，当看见别人的孩子受到伤害时，请不要保持沉默，请给予力所能及的保护。因为保护他人的孩子，本质上就是在守护你自己的孩子。

请记住，每一次在罪恶面前的沉默，都在悄悄透支着未来的平安。不要让你的沉默，成为灾祸的因由，更不要让它酿成痛失爱子这样的人难以承受的悲剧。◇

[1] 资料来源：《明慧周刊第 1001 期》；天道好还 又一中央 610 副主任落马。
<https://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4/7/5/天道好还又一中央610副主任落马-294271p.html>

明慧报告：610 人员恶报综述（下）（包含杨的案例）
<https://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6/8/6/明慧报告-610人员恶报综述（下）-332515.html>

不被原谅的致歉

文 | 钟鼎

【明慧网】当集体意志与道德良知发生冲突时，个人应当承担怎样的责任？有人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年少轻狂，孰能无错？尤其在政治动荡、社会混乱的文革时代，跟风参与揭批，跟随参与武斗，跟从参与打人，这些都司空见惯，不足为奇。虐杀真的可以道歉了事吗？

一、历史的血迹

一九六六年六月，文革（革文化的命）运动爆发，各大校园陷入混乱。当时毛泽东支持红卫兵，导致学生对老师的“批斗”迅速由口头辱骂演变为肢体暴力。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现名实验中学）作为当时高干子弟云集的学校，斗争形势尤为激烈。



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明慧网）

二零一四年，文革时全国闻名的红卫兵宋彬彬，就文革期间批斗老师的行为，向老师致歉。而当年被批斗致死的校长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则发声明，痛斥其道歉虚伪，拒绝接受。

二零一四年一月二十七日，王晶垚在网上发表《关于宋彬彬刘进虚伪道歉的声明》：“……在‘八五事件’

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前，我决不接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虚伪道歉！”他还说过“这是错误吗？这是罪！对罪犯能宽容吗？”

“八五事件”是指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发生在师大女附中的一次极端暴力事件。事件以该校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卞仲耘被红卫兵学生毒打致死而震惊中外。它是文革初期“红八月”暴力风潮的重要标志，也是“文革中第一位被公开打死的教育工作者”案例。“八五事件”不仅是一个教育工作者的悲剧，更标志着当时的社会秩序和法律彻底崩塌。

然而，事件发生两周后的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宋彬彬为毛佩戴袖章。毛泽东得知其名后说：“要武嘛。”这一细节被视为对校园暴力的默许甚至鼓励，导致全国范围内的“打人风潮”失控。

无独有偶，在一场红卫

兵武斗中，十六岁的“大院”子弟王冀豫挥舞大棒打死了一位十九岁的青年。

二零一一年一月，六十二岁的王冀豫选择站出来承认罪过。“忏悔太虚了，我不求原谅，我认账，活该受折磨，遭报应。说出来，是为历史留下证据。”

之后不久，王冀豫接待了死者家属派来的律师，被要求不得再公布死者姓名。律师转达了家属的话：“我们不可能原谅你，因为我们家人死了。”

宋彬彬、王冀豫们的致歉，不被人原谅，还被人痛斥，这是他们自己的罪恶所致。错误可以原谅，罪恶则必须法办，不是原谅不原谅的问题。如果杀了人之后道个歉就可以不了了之，那就是社会对杀人行为的纵容，那么人间就会成为施暴者逞凶的乐园，受虐者、受害者就会层出不穷。过失杀人尚需负法律责任，何况暴力虐杀。



曲辉与妻女的合照。(明慧网)

二、当下的罪恶

在动荡年代，许多人以“听党的话”或“执行命令”为由参与施暴。然而，受害校长的丈夫王晶垚老人说：“这是错误吗？这是罪！”文革已经过去多年，但中共制造的动荡并没有结束。韩琼、乔威等人，在对待信仰群体时展现出的残忍，与文革武斗如出一辙。

二零零一年三月十九日

下午，辽宁省大连教养院强迫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大连市居民曲辉被该教养院的警察暴打，颈椎被打断。

曲辉生前描述：“我晚上九点也被拖到那个阴森恐怖房间里，警察对我的折磨持续到第二天早上八点。电棍不知换了多少根，橡皮棍把我身上多处打伤，臀部肌肉被打烂，膝盖打肿，颈

椎被打断，口吐鲜血，并多次昏迷……”“一次醒来后，教养院一名叫韩琼的医生在检查后说：‘没有事，还可以打。’我记忆最深的是一名叫乔威的恶警，极其狠毒，他一边打我，一边狞笑着对旁边的人说：‘多少年没这么过瘾了！’”长时间的毒打，导致曲辉全身瘫痪、严重水肿等等。二零一四年，曲辉病逝，年仅四十五岁。[1]

如果王冀豫可能是失手伤人，那医生韩琼、警察乔威就是故意伤人。只在十小时之间，曲辉由一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变为全身瘫痪的病人，医生韩琼、警察乔威的凶残与魔鬼无异。

罪恶累累的大连教养院已于二零一三年九月十六日被解体，这是一种现实的预演——没有任何高墙是永恒的。韩琼、乔威等人呢？当针对“真善忍”普世价值的这场迫害结束之时，就是其遭清算之日。到那时，他们

可能也会表示忏悔与致歉，但是太晚了，罪业已成。曲辉的女儿能原谅他们吗？天理王法能宽恕他们吗？医生被称为治病救人的天使，警察的职责是保护百姓。当医生鼓励打人，当警察成为打手，这样的罪孽人神共愤，绝不可饶恕。

三、苍天有眼

在文革中杀人之后，在四十多年的岁月里，报应如影随形：当年参与批斗女校长的三个同案犯，一人因肝癌早逝，一人身陷囹圄十载，而王冀豫本人也在一次事故中瞎了左眼。

他常在暗夜中醒来，问自己：“我打死人这事儿该怎么算呢？”“我没有想到我会掉头发，一抓就一把头发。”“有一天晚上突然就梦到一个穿着白纱的女人，纱上面还有血渍，我看不见她脸，她非常高，高极了，我躺在一个木板子上，也没

有枕头也没有被褥，就那么躺着难受极了，后来那个人就讲，说你要在这个板子上躺一万年。”

王冀豫说，他发现谁干坏事谁就要倒楣，比如六中打死人的，后来得肝癌死了；刀劈“小混蛋”的，一九七二年得白血病死了；还有得肝癌死的，煤气中毒死的。他说：“后来我才知道，苍天有眼。”“折磨我一辈子。”

结语：忠告

在对法轮功信仰二十多年的迫害中，明慧网能核实姓名的，就有几十万人被骚扰被恐吓，几万人被劳教、判刑，几千人被迫害致死；在活摘器官的罪恶勾当中，实际死亡人数何止几十万。每个参与其中的警察、法官、医生，都在迫害中助纣为虐，身上都沾满了修炼者的鲜血与泪水。

请停下犯罪之手。无论你认为是多么身不由己，那些

都不是随波逐流、残害无辜的理由。

请不要如王冀豫那样，在夜里惊醒，悔不当初；请不要像宋彬彬那样，在致歉之后，被人痛斥。

伤天害理为天地、良心、法律所不容，必遭恶报。关于良知的账单，终有一天上苍会与每个人一笔一笔地结算。今天的“身不由己”，就是明天“无法销毁”的铁证。组织的盾牌是有保质期的，个人的罪责不可能永远被遮掩，比如江泽民，即便已死，清算难免，子孙的报应也少不了。

善待落难者，帮助被害者，保护无辜者，这才是对自己与家人的负责与厚爱。

现在选择善待、帮助和保护，是以往用“法不责众”来自欺欺人的犯罪者们唯一的赎罪和自救机会。◇

[1] 资料来源：明慧网《明慧二十周年报告（2）》



当“亲情”被用来逼迫人背弃原则与道德底线时

文 | 起慧

(图片来源: iStock)

【明慧网】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亲情”都是社会道德的基石。当“亲情”被当作一种筹码或武器，用来逼迫他人背弃原则与道德底线时，于私于公后果均极为严重。

一、问题的性质：伦理的工具化与扭曲

在中国传统伦理中，亲情的核心是“义”，所谓“人伦大义”是“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爱他就要为他付出，忠于他就要规劝他）。

当亲情被用来逼人违背良知，比如背弃正信、背叛恩师，它就转变成了“陷亲于不义”。这是不孝、不仁、不爱的表现。

在西方哲学的框架下，将亲情伦理工具化的行为，违反了“人是目的，而非手段”的原则，是典型的情感勒索（Emotional Blackmail），也可以叫做道德绑架。施压者将亲情“工具化”，把对方对其家人的亲情，当作自己达成某种私利的工具，这侵犯了个体的道德主体性（Moral Agency）。

二、造成的后果：多重维度的崩塌

这种行为的后果往往是毁灭性的，通常难以挽回。

1. 对“受害者”：自我价值的破碎

造成道德创伤：当一个人被迫放弃道德底线，会产生强烈的自我厌恶与羞耻感。这种内心的冲突可能导致抑郁、焦虑或人格的平庸化。

导致信任瓦解：受害者会意识到，最亲近的人并不在乎自己的价值与人格，只在乎眼前利益。这会导致其对人性与社会契约的彻底失望。

2. 对“关系”：情感的枯竭与死亡

纽带变枷锁：亲情原本是温暖的港湾，现在变成了囚住自己能动性的监狱。

防御性疏离：为保护剩余的自我，受害者会选择在情感上“关机”或在关系上逃离，最终导致家庭关系破裂。

3. 对“社会”：破窗效应与正义的销蚀

道德滑坡：如果一个社会普遍容忍“以亲情之名行不义之事”，那么法律和公德将形同虚设。

4. 小圈子正义：会形成“帮派式”的伦理观

只要是为了“自己人”，什么坏事都可以做。这直接威胁到现代文明社会的法治基础。

三、历史的教训

文化大革命时期，亲情被政治忠诚所取代，家庭伦理遭到严重破坏，子女揭发父母、夫妻互相指控；社会信任全面瓦解，人与人之间充满猜疑；人们不得不在良知与自保之间做出抉择，甚至主动与亲人切割关系以求生存。这不仅使个体道德崩解，也让整体社会陷入普遍的不信任与冷漠之中。

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国

社会从未停止破坏人伦的政治运动，以至于今天，中国社会中人际互动高度防备、对公共事务冷漠，顺从权威而不信任权威，人们以各种形式互害并互相利用，真诚不再，善良不再，忠诚变质。

曾有大陆知名网站发起网上投票，调查“老人摔倒街头应不应该扶？”有近十三万人参与投票，投票结果显示，62.54%的人选择“绝对不会扶，怕惹麻烦”，仅有4.01%的人认为“肯定应该扶老人，这是起码的公德”。中国社会的冷漠与道德滑落可见一斑。

四、现实的后果

“亲情勒索”在当代社会各群体中都有体现。从父母强制子女接受“我为你好”，到利用亲情强制法轮功学员毁谤恩师、放弃正信。那些用亲情逼迫亲人的人，往往也是恐惧的受害者，他们被体制威胁，转而将恐惧传递

给至亲。看到亲人受害后的痛苦，他们往往悔不当初。

最残酷的后果常发生在启动“亲情勒索”者的身上。例如那些利用法轮功学员的善与亲情，以达成上级交付的“转化”任务的执法者，虽然他们只是执政者实施迫害政策的工具，却承担一样的后果。让我们看看现实中的几个实例：

郭元生，原辽宁省凌源监狱管理分局政委，“六一零办公室”主要负责人，为了达到让法轮功学员放弃正信的目的，他用子女考大学、晋升职称、开除公职、停发工资等手段来要挟。给法轮功学员和家属造成了精神和身体的极大痛苦。[1]

二零零三年年末的一次大会上，郭元生突发小脑主干出血，于二零零四年二月六日在北京一家医院死亡，卒年五十八岁。应了“凡人有过，大则夺纪（减寿十二年），小则夺算（减寿一百天），

算尽则死”的天理。

梁俊洪，原山东省肥城市安庄镇武装部长。他积极参与指挥民兵监禁、殴打、迫害法轮功学员，凡是学员亲属的子女，他一律不准当兵。他邪恶地说：“炼法轮功株连九族，别想当兵、考大学。”梁俊洪于二零零零年五月因癌症突发死亡，卒年四十六岁。应了“算尽则死”的天理。[2]

这些人不仅遭受了病痛折磨，更在历史中给家族和后代留下了耻辱的一笔。

五、结语

利用亲情逼迫家人放弃原则，本质上是对“爱”的背叛。真正的亲情，应该是彼此道德完善的支撑点，而不是拖人落入深渊的绳索。

无论是用亲情逼迫家人放弃信仰，还是利用别人对其家人的亲情逼迫人放弃做人底线，都是在毁坏“亲情”作为家庭与社会安稳的基石。

人生百年，权在手只是一时；世事难料，在中国，权力的保鲜期谁能保证？何况苍天在上，还有天理在管。来时两手空，死时业随身。

亲情的核心是“义”，当亲情被利用来行“不义”，亲情已变质。人来世间不是为了享受亲情或为亲情所困扰，而是为了爱他人，包括我们的亲人，成为他们夜空的北斗、渡轮的船长。当看透亲情的实质，那些想利用亲情对我们进行道德绑架的人，其实是没有机会的。◇

[1] 资料来源：辽宁凌源监狱 610 头目迫害大法遭天惩，明慧网 2004-02-27. <https://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4/2/27/> 辽宁凌源监狱 610 头目迫害大法遭天惩 -68488.html. 引用日期 2026-04-10。

[2] 山东迫害大法的邪恶之徒们遭恶报，明慧网 2001-10-23. <https://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1/10/23/18458.html>. 引用日期 2026-04-10。



2026年4月19日，台北市政府廣場。法輪功學員紀念1999年“4·25”萬人和平上訪。

下图：2026年4月25日，倫敦市中心。英國法輪功學員遊行並舉行新聞發布會，紀念萬人北京和平上訪27週年，市民和遊客前來了解真相。（明慧網）

